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

——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1949—1956)

桂勇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KUIJI CHUBANSHE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

——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1949—1956)

桂勇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KUIJ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桂勇著.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1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ISBN 7-5429-1581-9

I. 私... II. 桂... III.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中国—1949~1956 IV. F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557 号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021)64695050×215 (021)64391885(传真) (021)64388409
网上书店	www.Lixinbook.com (021)64388132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 编	20023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E-mail	lxaph@sh163.net
E-mail	lxzbs@sh163.net (总编室)

印 刷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429-1581-9/C·0013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作者简介

桂勇，1973 年生于江西修水。1991 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99 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2002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 年，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研究人员，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等，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解读中国20世纪的“大转折”提供了另一种文本。这一文本截取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片段,解读的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题。本书更关注的是个案而不是事件本身,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个案来研究,而不是把它作为历史事件来研究。本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权力、产权、社会行为者的关系。

本书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的一种。本书的独创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种视角。在相关问题研究中,充分吸收了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复旦大学 伍柏麟 教授

丛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复旦大学 丁栋虹 教授

复旦大学 韦 森 教授

上海社科院 左学金 教授

复旦大学 石 磊

复旦大学 史正富 教授

浙江大学 史晋川 教授

复旦大学 刘 昶 研究员

复旦大学 张 军 教授

复旦大学 张晖明 教授

同济大学 胡景北 教授

复旦大学 袁志刚 教授

北京大学 夏业良 教授

丛书总策划 孙时平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前沿研究丛书”总序

伍柏麟

历经 2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乐观的预言认为 20 年后的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但即使在这种高速增长和乐观预期的氛围中,更需要认真思考和审视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我们离开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架已经是如此之远,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种新的我们不太熟悉的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但又在许多方面模糊不清。

改革的实践与问题对既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从改革伊始,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来看,是改革的实践在检验理论的生命力,而不是相反,抱残守缺与盲目崇拜都不足取。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期受到前苏联和斯大林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内容已经严重落后于改革的实践,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无法简单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范式来解释的现象。在新的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需要以新的参照系和新的视野来审视改革问题,明辨改革的成败得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二个层面来提炼改革的大思路。目前最为关键和迫切的问题是重新审视关系到中国社会繁荣与和谐发展的制度层面的问题。

从制度层面来透视中国的经济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的改革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丰富的素材,已成为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大金矿。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生逢其时,面对今天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诸多现象与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不

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可以回答和解释得了的,在接受国际学术范式的同时我们更关心本土问题。通过对本土问题的近距离观察、理解和透视,我们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在新的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国际化视野来审视改革的成败得失,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正是在这种信念与欲求的驱使下,我们组织和编辑了这套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丛书,丛书计划采取开放式,由编委会长期负责选择、推荐符合丛书精神和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陆续出版。首批选定的书目共计六本,分别是《私有产权和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1949~1956》、《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中国:人口过剩与土地改革》、《从商品、产权到行为空间》、《药品价格管制的经济分析》和《宪政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等。尽管丛书的作者有着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不同学术背景,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对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中国的人口过剩与土地改革、产权改革、药品价格管制、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其总体特征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某一层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其中包括桂勇博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新研究与解读,重新从宏观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与所有权、与社会动员的关系,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权力、产权、与社会行动者关系。范剑勇博士尝试用 Krugman 新贸易理论中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理论来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强调地理因素与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互为因果关系。他的研究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本质上是与人口聚集互为因果循环的累积过程,而这个机制对西部地区的含义是加快西部农民向当地城市迁移,以便促进本地的制造业发展。赖涪林博士将中国土地改革全面放在世界经济背景与世界土地改革和自耕农制度变革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通过对佃富农和佃中农经济的实证分析,揭示了

新地主、佃富农、佃中农和游民无产阶级等阶层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变化中的经济学逻辑关系；揭示了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的内在历史关联，并从土地改革追溯了决定现代中国土地制度某些经济特征的历史性规定与制约。李健博士则通过对企业的本质、边界、产生及存续理由、相关制度和契约以及“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等诸多问题的较深入梳理，对国企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耀忠博士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应用信息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经济理论，重点研究了药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发达国家药品价格管制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目前的药品价格管制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王小卫博士应用宪政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了尝试性解释，认为“计划经济”的概括并没有很好的反映出传统经济体制内在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出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全能政府及其所界定的权利结构为支撑的经济系统，经济转型过程是权利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并把经济转型界定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与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游戏规则的两个层次。针对政府—市场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宪法—政府—市场三分法的分析框架。

丛书的作者都具有博士学位和在国内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极其虔诚的态度，已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在国内与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套丛书是他们对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奉献一份绵薄之力，以期通过与学术界的交流和碰撞来推动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这部丛书的顺利完成，首先感谢学术界同人的慷慨支持，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本套丛书撰写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还要真诚感谢立信会计出版社孙时平总编辑的支持，感谢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方士华先生，正是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劳动，才使这套丛书能如此迅速的与广大读者见面。

2005年12月20日

序

整个 20 世纪都已经成为历史。这段历史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五十年被看作近代史，后五十年被看作现代史或当代史。这样划分的部分理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在社会制度变革意义上区分了新旧两个中国。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以 1949 年为分界线，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类似波兰尼所说的“大转折”(Great Transition)。“大转折”的特征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为诸多宏大叙事研究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所描述。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这个“大转折”的具体情节？譬如，这种转折是如何开始的？其内在逻辑是什么？经济、社会与政治如何相互作用？等等。

毫无疑问，不同学科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着不同的视角，因而有着不同的解读方法。这种解读，依其关注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试图通过对历史变化的解读来分析“大转折”的方方面面；另一类是对历史剖面的关注，试图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来研究“大转折”的具体细节。前者又有历时性与现时性研究之分，而后者也有整体研究与局部研究之别。所有这些研究，为我们比较准确地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以及相应的丰富的研究文献。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为解读中国 20 世纪的“大转折”提供了另一种文本。这一文本关注的是“大转折”具体情节，撷取的是历史的一个片段，而解读的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题。“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半叶，在历史文献中被看作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因为，全国解放

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着,“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消灭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许涤新、吴承明,1985)

这样的“大转折”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大转折”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发动的?实现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其社会经济意义何在?对后来的历史有何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学者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感兴趣的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从各自学科视野已有了诸多解读性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是十分有益的。不过,从这些文献看,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史实描述多而学理分析少,宏观解读多而微观探讨少,特别是,对于“大转折”中具体情节,如“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宏观制度安排与基层发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理等,已有的研究似尚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桂勇的著作《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同样是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但桂著更关注的是微观个案而不是宏观历史,更关注事件过程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个案来研究,而不是把它作为历史事件来研究。这样,在宏观层面,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与所有权、与社会动员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权力、产权、与社会行动者关系。换言之,它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新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回避了常用的纯粹文献研究,而是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他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充分吸收了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历史资料处理上,则偏重于将宏观层面的文献资料和微观层面的典型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特别是采取了社会学中的个案研究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在宏观层面的文献资料研究基础上,作者以上海的兴中造船厂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个案展开研究。作者充分利用上海的兴中造船厂留存下来的档案材料,佐以大量的研究文献,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诸多理论问题重新加以检讨,得到了作者自己的发现,作为一项新的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些发现容有被批评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然而,作者应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资料,来探讨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性和本土化的今天,是应当受到鼓励的。特别是,作为年轻的学者,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浩瀚的史料中耐心地剔抉爬梳,沉潜学术,反复钻研,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桂勇曾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从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到经济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期间,心无旁骛,潜心学术研究,曾先后参加由我主持的多项课题的研究,也和我合作出版了多种著作,本书则是他第一本完全由他个人完成从选题到成书全过程的研究著作。成书后曾请上海大学的李友梅教授审阅,尔后嘱我作序。我以为,学术著作的质量应由同行和读者来评判,并不一定非“序”不可,可在他坚持再三之下,还是写下了如上文字。

是为序。

朱国宏

2005年12月8日于一缘斋

前 言

对一个对中国现当代史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城市基层社会的变迁历史是一个尚待发掘的宝库。其中原因,与许多因素有关。固然,一些客观条件造成了城市研究中的遗憾,但研究的可行性却是其中关键的因素之一。与农村高度浓缩的重合型社会—空间结构不同,研究者观察能力所及的具体的城市空间范围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在固定的空间边界内社会关系的密度过于稀疏,活动量在个人的全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足,社会性的功能单一片面。这些特征足以令研究者无法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行完整的勾勒。城市的过大令研究者无从着手,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深入微观探索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仍旧可以找到某些能够进行实际观察的“城市空间”。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态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的企业就是这样的一种空间。在当时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企业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权力、组织等基本社会要素都包容在其中。以“单位”形态出现的城市企业与农村的地域共同体一样,具有浓缩的社会—空间结构,足以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包容很大一部分的城市生活。这样,对企业的研究将有可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城市基层社会变迁历史的理解。

本书是我与吕大乐、邹旻两位先生合作研究的一项阶段性成果。在几年以前,我们选择了上海一家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作为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历史的具体对象。最初,我们打算以“城市基层共同体的社会变迁”为研究主题。不过,在进入实地调查阶段后,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这一主题作出哪怕是浅尝辄止的探索。于是,我们

在内部进行了分工。本书是我所承担的那一部分工作的成果,也是整个研究的第一部分。在这本书中,我将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的产权变迁——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微观后果进行描述与分析。或许,将来读者可以见到研究的另一部分成果的出版。在那一部分中,我们将主要从“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这一主题出发,对产权变迁以后发生于城市基层的社会变动予以详细描述。

支持这样一项研究的精神动力,来自于与历史有关的某种好奇心与责任感。我们认为,通过“企业”这样一个“容器”与微型社会共同体来描述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可能是颇有意义的学术实践行为。的确,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提醒自己:现在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收集”历史,“保存”历史,甚至是“撰写”——或者说“改写”——历史。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书中的许多内容是以原始资料的形式直接与读者见面的。除了一些语言方面的简单修饰工作(例如把口述史资料中某些不合语法的口头语言改写为较为通顺的书面语言)外,几乎没有作其他学术性的处理。对此,还请读者原谅我的懒惰。

历史的神秘面纱迟早有揭开的时候,但关键在于是什么时候揭开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状况,因为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斩断的血肉联系。幸运的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可以引导我们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

桂 勇

2005年12月1日

目 录

1. 导论	1
1.1 引言:国家、所有权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1
1.2 文献检讨与研究方法的选择	4
1.3 行动、权力与产权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8
1.4 穷途末路的资本家:自愿合营的经济社会基础	23
2. 产权改造的政治背景	33
2.1 国家的目标与政策	34
2.2 改造资本主义的构想	36
2.3 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	40
3. 运动的震慑	51
3.1 “运动”策略	53
3.2 一些个案	65
3.3 运动的后果	88
4. 自由市场的消亡	101
4.1 “五反”运动与市场的政治重构	102
4.2 新市场结构的形成	106
4.3 加工订货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控制	125
4.4 加工订货:利益分配与责任问题	136
5. 企业控制权的变化	150
5.1 加工订货与产权的割裂	151
5.2 劳资关系问题	153

5.3 企业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	162
5.4 所有权利的分割	177
6. 信念的控制与心理结构的重塑	193
6.1 “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194
6.2 “他者的压力”	199
6.3 所有者、阶级与角色意识	207
7. 权力、国家建构与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215
7.1 公私合营：资本主义的最后脚步	215
7.2 “自愿的服从”	233
7.3 权力、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历史发展	245
8. 重塑社会结构：人的改造与平等	255
8.1 人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最后消亡	255
8.2 工人：教育与改造	283
8.3 平等主义及其限制	299
9. 动员与控制：从经济的逻辑到政治的逻辑	319
9.1 动员：企业的“新”运作机制	319
9.2 国家、企业与对城市基层的控制	337
10. 结语	364
附录 穆易的“资本家生涯”	370
参考文献	384
后记	394

1. 导 论

1.1 引言：国家、所有权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作为“国家”与“经济”结合部的主要表现形式，财产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遗憾的是，许多经济理论都潜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对财产的所有权利的行使是在私人活动空间内进行的，而这一空间则是一个不受外部政治力量干预的自治领域。但是，这一假设却受到了来自于现实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其中的一例，因为它生动地叙述了一个私有财产制度如何在国家力量的不断侵蚀下被彻底瓦解的故事。事实上，历史学家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一产权变迁中国家政权力量的作用，例如胡绳(1999)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企业产权由私有向公有的转换。那么，城市的这种产权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推动者的意图为什么能够成功实现？变迁本身又带来了什么后果？这些正是本书试图予以解答的问题。不过，在对此作出具体描述之前，先让我们来简要考虑一下与此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特别是作为政治体系集中表现的“国家”与作为经济体系核心而存在的“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里开始涉及产权制度的“政治建构”问题。事实上，财产权利是